

中国伦理学史

下 册

陈少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伦理学史

下 册

陈少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伦理学史 下册/陈少峰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5

ISBN 7-301-03381-8

I. 中… II. 陈… III. 伦理学-思想史-中国 IV. B82-092

书 名: 中国伦理学史(下册)

著作责任者: 陈少峰

责任编辑: 刘金海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381-8/B·162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印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285千字

1997年7月第一版 1997年7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3.00元

目 录

第 八 编

第 四 十 章	近代思想与价值观的演进·····	1
第四十一章	康有为·····	12
第四十二章	谭嗣同·····	28
第四十三章	严 复·····	41
第四十四章	梁启超·····	54

第 九 编

第四十五章	社会思潮的激荡·····	72
第四十六章	王国维·····	84
第四十七章	章太炎·····	93
第四十八章	孙中山·····	104
第四十九章	蔡元培·····	117

第 十 编

第 五 十 章	新文化运动·····	129
第五十一章	陈独秀·····	146
第五十二章	李大钊·····	158
第五十三章	鲁迅·····	171
第五十四章	胡适与周作人·····	181
第五十五章	科学、宗教与道德·····	196

第十一编

第五十六章	伦理学观念与方法的变革·····	207
-------	------------------	-----

第五十七章	教育与社会改造·····	218
第五十八章	张东荪与张君勱·····	228
第五十九章	梁漱溟与熊十力·····	241

第十二编

第六十章	冯友兰·····	257
第六十一章	贺麟·····	271
第六十二章	唐君毅·····	284
第六十三章	牟宗三·····	296

第十三编

第六十四章	共产主义道德源流·····	309
第六十五章	毛泽东·····	320
第六十六章	道德与阶级意识·····	332
第六十七章	当代伦理学的发展·····	345

后 记	·····	359
--------	-------	-----

第八编

第四十章 近代思想与价值观的演进

当社会严重沉滞、思想衰竭之际，敏锐的思想家龚自珍曾预言大变局即将降临。然而，包括龚自珍以及他身后的文人士子们都没有预料到，这种变局竟如此迅速、严峻而富于冲击力和震撼力。因此，当大变局一旦骤临，积极关怀社会进步的文人士子们身处其中时，仍然经历了思想与价值观念变革的严重挫折。

以英帝国为首的列强发动的毒品侵袭和殖民侵略战争就是“大变局”的“吹角”，无论是它的形式还是内容，对当时进步的士大夫来说都是严苛而屈辱的。鸦片流毒的蔓延和接之而来的占地索赔，既表明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虎视眈眈，暴露了封建王朝专制的软弱无能，也促使社会危机清晰地呈现出来。因此，“梦里吹角连营”的新的直接的外患，在客观上唤起士人们对社会的重新关注和反省，同时也激发了从思想疲惫中的振作与奋发。尽管承受着夷敌所带来的强烈耻辱感，内心焦灼忧惧，但他们却在此状态下打开了视野，将学问视点投向救国救民的事业，开始了新的经世热忱。

当大变局骤临之际，一些有志之士便开始针对时局筹思对策。这些对策基本上是围绕国力衰竭的主因即官僚腐败、鸦片泛滥、人才凋敝、国防薄弱等等的改革而提出来的。随后，又因外来军事上的以强凌弱和世界格局的重新展示而使他们打开了视野，不再闭目于既有的大帝国中心意识，并通过比较性的分析，开始认识到富

国强兵与科技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强烈的危机感和新观念的萌生,开始带动政治思想的活跃与价值观的微妙变化。一方面,思想敏锐的士人们集中关注了国富民强的策略,因此在思想上逐渐倾向于经世致用。新的经世致用思想与救国救民意识相互激荡,经世致用的首要目标是救国。当然,尽管目标非常明确,但他们仍然需要把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即,要解决救国问题,首先必须找到国力衰落的根源。一经省察检讨,他们发现,国力之衰的原因在于民力之衰,而民力之衰的关键乃在于官僚腐败、鸦片泛滥以及道德不振、生活无依。易言之,振民才能救国。在新形势下,思想敏锐的士人们逐渐改变了理学家式的纲常振民,而走向政治改良的制度变革和解救民困的人道教民。另一方面,随着由海路而来的列强力量显示,国家并存的世界意识逐渐替代大中华核心的传统国家观念。士人们及时了解“夷国”状况和世界形势,运用认识论的武器和地理、文化知识,(如魏源)描绘出《海国图志》。在中西制度及国力强弱比较的逐渐开阔的视野中,士人们清楚地看到科技振兴和选拔人才的迫切性,由此迫切性而反省整个社会制度,进而提出变法改革之策,走向政治上的革新立场。

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变革,这一意识之逐渐深化,成为近代思想的最根本契机。从整备国防改革内弊开始的思想形态,通过嫁接方式将所谓的中式的道德精神与西式的精兵强炮相结合。在这一逐渐重视洋务的借鉴之时,中体西用的思想特征极为显著。中体西用的思想方法是传统的,观念则具有近代性的意义。尽管其中反映出传统哲学方法的模糊性和随意性,但它却成为洋务派的坚强哲学基础。它一方面体现了传统观念向近代思想转变的契机,另一方面,保守派也藉此捍卫传统思想价值观的“本体”地位,构成抗拒近代思想的最顽固力量。中体西用的明确思想最初是由冯桂芬提出的。在他主张采撷西学所长时,提出了“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①。虽然冯

氏并未仔细考察体用关系的哲学结构,但他在因应时局变动之际,确实找到了初步的对应措施。中体西用的方法,无疑是变革初期必然的选择,对于克服改革阻力和稳定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尚未具体化的中体西用口号,在改良运动兴起之后被保守派张之洞等人加以总结利用,成为他们的精神指南,以此对抗近代的价值理想。正因为中体西用思想在方法上包含任意性解释环节,在价值理想上有利于保存中体(文化传延),因此,它在近代发挥了双重作用,在现代也依然为一些哲学家所倚重,成为近现代思想价值观的基本方法原理指导之一。

当思想开始转折之际,体现保守派最积极的富国强兵政治纲领的是曾国藩等人的经世思想。曾国藩是一文武兼精的封建社会最实际的经世之才。一方面,他秉持着传统的以忠孝为大本的伦理思想,不仅体现在他训练湘军、通过纲常宗法封建伦理的强化和军事才能的结合,成为正统封建社会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力量,体现为真正的国力保证,并且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反抗运动,推迟了清帝国的灭亡;而且,他是一位有效地运用传统价值观以及实际的谋略而颇有作为的封建干才。另一方面,在他继承理学思想的同时,赋予了它某些新的时代适应性。首先,他指出,经世致用在于才能之发挥和人才之涌现,文章、学问义理、军事作为专门才能,容许各有所重,从而矫正了许多理学家完全以纯然天理判定人才的迂腐观念。其次,他并非单纯将理学作为学问,作为正统社会的象征,而是强调通过经世的实践加以贯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强调识时务达时用,即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兴国活动必须与伦理的复兴相统一,即以大义和具体才能的结合为新的价值核心。他自身也在实际的家庭社会活动中体现出纲常伦理、日常美德和管理经济的实践特点。易言之,他是中体西用真正加以实际运用和完善传统的代表人物。再次,无论从他的思想还是社会活动,都体现了传统的道德榜样特征。他自身总是勤恳精忠、以身作则、隐

忍中庸,从不露才扬己。当然,曾国藩既没有针对时局的迫切需要提出改革官僚、军事、外交等制度方面的整体设想,也不可能找到力量实现改革的愿望。他的政治思想活动似乎明白地告诉时人: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任何试图在旧有伦理和政治制度下精忠报国的努力,都显示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

中体西用思想在其他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那里得到总结与贯彻。当器物革新的意识高涨之际,随之出现具体的对应措施。如,如何改革科举制度,培养精通技术专门能力之才,办洋务,通商办厂等方面。它逐渐推动政治制度改革的思路之展开,尤其是那些接触西学较多、能够亲自感受西方制度优越性之士,开始逐渐议论如何改革制度。其中有理解西方长处而以传统文化加以配合解说者。如李凤苞指出,西国制治之要,有五大端,即通民气、保民生权利、育民智、养民耻废毒刑谨法制以及富民。他认为此有效制度可通过发挥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实现:“其治国其家,持躬接物,动与尽己推己之旨相符,直合王霸为一,而赅赅三代大同之治矣。此孔孟之道也。其政治规制,既合《周官》八法八柄九两九职,以至邦交之合行人,制器之合考工,无不缕晰条分,整齐划一。制法者既公而无私,奉法者即久而无弊。此官礼之道也。本百折不回之志,以立坚强不拔之操,无嚣竞,无浮躁,遇事则以静制动,行权则欲取故与,实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之概,迥非补苴张皇之治,所得希其万一。此黄老之道也。至于穷事物之理,则无论格致等学,必抉其疑。即政治律例,公法理财治狱之书,莫不元箸超超,辩才无碍,绝无影响附会,臆度总揣等病。有内典之精深,而无内典之隐晦。皆其深造自得,贯通了悟之证。此佛氏之道也。”^②尽管这种中体西用思想在形式上很迂腐,但在政治改革的意识上已经比较明朗。此外,集中于思考制度而又明切指陈现存制度的弊端者则如郑观应提出了改革学校教育与开设议院、君民共主之论。薛福成也提出了比较积极的变法论。郑氏仍然保留西学之精华与传统文化同

一根基之论,如他说:“自学者骛虚而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攻,汨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而中学日见其荒,西学遂莫窥其蕴矣。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此其时也。”^③薛氏的主张则较直接。他指出:“我国家集百王之成法,其行之而无弊者,虽万世不变可也。至如官俸之俭也,部例之繁也,绿营之窳也,取士之未尽得实学也,此皆积数百年末流之弊,而久失立法之初意。稍变则弊去而法存,不变则弊存而法亡……世变无穷,则圣人御变之道,亦与之无穷。生今之世,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氏之世,而茹毛饮血,居黄帝之世,御蚩尤之暴而徒手搏之,曰守我上故圣人法也,其不惫且蹶者几何也!”^④这种明确的政治变革思想逐渐蔚为强大的冲击力。

变法思想风气一开,为近代价值观的确立铺垫了几个方面的契机。其一,富国强兵,王霸兼备。欲富国,则必富民,以民生为大事。富贵为人之所望,则人性之新观念由是诞生。易言之,人人求私,“私”并非就是大恶,关键乃在如何集私为公。此通过变法改革制度可以实现。许象枢在反驳保守派认为中国民风士俗不善、自私而必坏制度时指出:“泰西之设议院,亦合众小私成一大公也。知一事也,而民欲之,必其利己者也。然一人欲之则为私,人人欲之则为公矣。一政也而民恶之,必其害己者也。然一人恶之则为私,众人恶之即为公矣。即有时众意见不合,各执一事,亦可互相辩驳,使曲不胜直,非不敌是,复可虑其有弊乎?中国诚能行之,将见君民联为一气,家国合为一体。古所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不难再见于今日。”^⑤在这里对理学以来价值观的冲击,既体现为对人性与利害关系的新认识,同时,也突出了以民为邦本的政治理想之复活,成为新的人道主义思想之基础。其二,由此开辟借古变今的改革模式。关于变革制度的种种主张,时常与传统的与时推移、日变成新的观念相佐证,逐渐确立了社会发展的意识,打破了

循环论以及不变论的模式,为进化论的引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以古说今的思想解释方式之出现,为将传统文化阐释为与近代价值观相统一的内容铺平了道路。同时,从经济、技术、管理、政治、教育、言论自由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变法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与观念的相互促动,直接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实践。当变法观念冲击政治制度之际,伦理变革已然包含其中。因此,其三,则为伦理变革之先导。在比较的视野中即在世界意识背景下开展的变法运动,其向西洋学习借鉴之措施的提出,必然考虑到人性基础、伦理风俗基础;欲证明那些措施适合于中国情势,则必论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这里,传统文化中的普遍性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李元度曾经提出,既然以仁者与万物一体为教,则夷人何得不在所立范围:“……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物之性且当尽,况彼固人也,同在并生并育中,听其自外伦纪,而终失其性,其何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乎?圣人有教无类,必不忍此也。”^⑥风俗之好坏系于人心,而人心之善的力量的凝聚在于安民、利民而使民众自觉于善。如此,只要打破弊法,重新振奋精神,上下同心,必能实现和谐的伦理,也就能够造就善美之风俗。当然,这种意识中仍然包含着保守派的道不变论,即以中华伦理为人性之普遍化原理,如王韬强调天心变于上,则人事变于下,泰西既变,则我国亦当变,因为基础一也:“夫孔子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胥自此基……吾向者曾谓数百年之后,道必大同。盖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⑦因此,打破既有伦理普遍性而审思其合理性的思想,虽然基于同样的普遍性原理,却与道不变论不同,故其普遍性也标识为“公理”概念,如康有为、唐才常等所主张之政教制度之普遍价值。而此与伦常方面全面捍卫传统的保守派产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构成了近代文化政治运

动的焦点问题。当然,在追求大同社会的价值理想中,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吸收外来思想,都是沿着社会的普遍性原理展开的,并且在其中容纳了不同的浪漫的理想主义。

承接着深厚的伦理制度文化基础的近代变革,在伦理思想上的革新运动,昭示着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的转折,成为人道主义价值观确立的重要环节。伦理变革的核心是君民关系与男女关系,而要点在打破君主独尊与解除束缚女性的压迫力量。从传统民本思想开始动摇君主专制制度,从而动摇独尊观念。至于在发挥人才充实国力的口号下借鉴西方君民共主的议院制度,逐渐产生了独立的人格观念和平等伦理。它无疑基于如上所论的普遍性原理,也通过阐释经学来强化其说服力。如唐才常之论曰:“今夫春秋,上本天道,为性法出于上帝之源;中用王法,为例法出于条约之源;下理人情,为民权伸于国会之源。故内圣外王之学,不过治国平天下。平之一义,为亿兆年有国不易之经。即西人之深于公法者,罔弗以平一国权力平万国权力,为公法登峰造极之境。”^⑧当然,由于它直接与等级秩序的变革和制度的革新相一致,所受到的阻力也比开女禁方面更强烈。在打破女性压迫樊篱方面,从俞理初的《贞女说》、《节妇说》中已经对女性身份性伦理的酷毒提出了批评,其揭示的现实催人泪下,其警戒之言发人深思:“尝见一诗云: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樽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人死,请旌籍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返魂。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⑨此感情与理论上的双重震撼,固使如谭嗣同等总结出三纲杀人的伦理现实并加以激烈抨击。经由郑观应、康有为等人积极提倡兴女学、废裹足的思想以及实践活动,逐步进入深化对女性受压迫伦理的抗议,使女权运动成为改良运动以及其后的伦理政治思想焦点之一。对于片面伦理义务的否定和平等道德的追求之结合,体现出改良派

思想家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挥特色。

太平天国在反抗清政府统治的理论指导方面,运用了伦理变革的思想力量。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明确地将平等伦理之实现解释为革命反抗运动的目标,并且在实际的军队组织中落实了这一基本纲领。它甚至吸收了传统乌托邦的道德社会理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念来攻击其内外的敌人。例如,太平天国在伦理上宣传道:“遐想唐、虞三代之世,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选上德。尧舜病不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忧饥溺,何分此民彼民;汤武伐暴除残,何分此国彼国;孔孟殒车烦马,何分此邦彼邦。盖实乎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理化,远而中国亦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⑩然而,其伦理的变革与传统道德社会乃至享乐要求的实现要求交织在一起,反映出过渡时期的思想复杂与混乱状态。太平天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平等愿望与组织结构、管理形式中平等与专制之间的严重冲突,导致了自身的危机,终于未能在思想发展的方向上产生富于创造性的影响力。

不断深化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忧患推动了思想的变革行程。甲午战争成为引发新的思想凝聚力量的导火线。在家国危亡以及民生艰困的现实面前,在创深痛巨的情感激发下,在日本由后进而至于征服中华帝国的改革成功示范下,思想家们终于在解救邦国危亡和关心民生苦痛方面倾注了激荡的情感,自觉于殉义的天命,迸发出摧枯拉朽的吼声。逐渐深入的思想运动,提升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总结并阐释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纲领。通过配合进化论的历史以及社会发展观,确立了近代的思想体系。基于人道主义自觉,基于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思想家们终于摆脱犹豫与守成,向阻碍这一目标的社会势力挑战。严复说:“今吾国之所最患

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何则？所以使吾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尔。继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尽气、鞭手茧足以求之。惟为之为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订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吾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愈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何则？神州之陆沉诚可哀，而四万万之沦胥甚可痛也！”^①这一激情奋发的思想宣言，并非说明手段就是一切，而是强调面临救国救民大义与否之选择问题，当不可踌躇观望，理应排除陈腐观念，勇猛直前。同时，它也宣告了变法的正当性。

近代思想与价值观的酝酿在 19 世纪末期达于高潮，并且指导着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的改良，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士大夫的救国救民的改良运动。改良运动具有重要的伦理思想史之意义。一方面，变法本身是试图调节伦理关系的重要活动，而它的价值追求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社会价值意识。维新志士的爱国热忱和献身精神，既继承了传统的道德实践精神，同时通过他们对打破专制政治及其伦理而献身的行动，促使以后的思想家们对专制制度及其伦理的现实和发展方向进行深入思考，也激发了民族精神的凝聚和献身精神的弘扬。另一方面，改良运动自身也促进了思想队伍的分裂，既促发了改良派自身对伦理改革运动成败得失的反思，也促进革命派思想家积极的革命意识和民族主义精神。而作为改良运动指导纲领的思想目标及其思想方法，尤其是平等思想以及通过自由实现平等的思想，道德进化的思想，产生了经久不息的深远影响。改良运动中所提出的初步的民主政治理想、积极的人权观念和反复古的进化史观，开辟了思想的新时代，奠定了启蒙主义的思想基础。

改良派思想家除了在救国救民的热情激励下勇于吸收和宣传新的价值观之外,也积极地重建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提出了新的人性论。不过,尽管他们敏锐于新思想的吸收,洞察到传统观念的陈腐,但他们并没有完成新思想的布局,也没有确立起平等伦理的价值哲学基础。在不中不西的思想观念中,既满溢着激情,也荡动着冲突。当思想的内在矛盾因实践的激化而使他们自己不能驾驭时,他们只能退而抱残守缺。但他们的思想纲领,却几乎都已经被年轻的革命家所信仰而接受了。这样,当他们冲锋陷阵时,他们是孤立的;而当他们痛定思痛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远离自己曾经高扬的旗帜队伍了。

试图通过道德力量推动社会完善的深厚意识,使改良派思想家对传统伦理道德有着强烈的依赖情绪,使他们面对新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犹豫、彷徨与悲怆。当他们回顾改良运动中自身思想的弱点时,几乎无一不认为自己传统伦理的把握不足。可以说,他们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就在于,偏离了以伦理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教育这一传统行之有效的经世之道,不仅将失去经世之本,也将失去处世之根。康有为之坚持孔教,是基于这一主张;严复之转为守旧,也是基于这一主张;而梁启超的思想历程之波折,常常与此相关联。时代转折时期的痛楚,直接的流血牺牲所带来的刺激似乎尚不如伦理运动造成的震撼之大。当他们从同情民众受传统政治伦理压迫束缚以及邦国沉沦而痛苦时,他们曾因人道主义的情怀而呐喊;当他们意识到伦理变革以及新的道德观念的出现反而导致人各为说、不能凝聚社会力量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反省自己的所思所行,重新开展起他们认为真正的事业,即救民于伦理道德的水火之中。于是,曾经是新思潮的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反抗新思潮的阻力,充满着斗争气息的思想运动重新开幕了。

注 释:

① 《采西学议》，郑振铎编：《晚清文选》，第 105—106 页。生活书店，1937 年 7 月版。

② 《巴黎答友人书》，同上书，第 163 页。

③ 《西学》，同上书，第 175 页。

④ 《变法》，同上书，第 218—219 页。

⑤ 《议院利害若何论》，同上书，第 314 页。

⑥ 《答友人论异教书》，同上书，第 129 页。

⑦ 《变法上》，同上书，第 400 页。

⑧ 《公法通议》，同上书，第 509 页。

⑨ 《贞女说》，同上书，第 23 页。

⑩ 《原道醒世训》。

⑪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严复集》第一册，第 108 页，中华书局，1986 年 1 月版。

第四十一章 康有为

康有为是近代思想史意义上的第一位思想先驱和领袖。在民族危机最严峻的时刻,他毅然担负起思想上启蒙和政治上变革的组织任务。然而,尽管他勇于高举民族大义的旗帜,但他的一生却非常突出和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中国进步士大夫的复杂性格和矛盾思想。他一生在思想方面的不懈追求和曲折发展,既反映了传统向近代过渡时期知识分子在自我思想蜕变过程中的自觉与积极态度,也体现出由于传统素养在他们血液中的作用,使他们不能轻易溶化思想跃进和价值观转折的近代性内容。他的思想性格中所体现出来的近代中国进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是难以克服的:既有强烈的发展愿望和与时俱变的觉醒、追求和突破;而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和复杂的时代选择,又常常感到力弱、茫然和孤独。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生当家国贫弱之时,学逢传统思想衰微没落之际。前者激发了他的救国拯民热情,后者促使他独思而广学。他是积极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思想代表之一。不过,更为深刻影响他思想人生的,还是传统教养中赋予士大夫以最富于人道情怀的救世济民思想。他早熟而又读书丰多,从小奠下经史诗文的基础。年19时学于朱次琦,朱氏教诲康有为应当多用力于济人经世之学,并主圣人之道而归大宗于孔子,使他“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可期”^①。自此而后,他对于世事越发敏感,但因为自己对于民生苦痛又无力援助,故常陷于苦闷恼恨、痴想和遐思中:“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此楞严所谓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归依之时多如